

1949—1979

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

概 论 卷

I206.5/4

DE83/22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

(1949——1979)

概 论 卷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33823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近代文学研究组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33823

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

(1949—1979)

概论卷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603 印刷厂排版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264 千字

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500 册

统一书号: 10190·036 定价: 1.10 元

建国三十年来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回顾

王俊年 梁淑安 赵慎修

一 情况概述

对于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历史时期文学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有人着手进行，并且也不乏值得珍视的成就。其中，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关于清末“谴责小说”的社会成因的论述，常常为人所称引；郑振铎一九三六年编的《晚清文选》，收录了起自林则徐、止于陈天华的一百二十余人的散文作品，名为晚清而与近代的时代基本相合，在历史的分期上堪称为远见卓识；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对清末的小说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叙述了一八七二年到一九二二年的文学发展线索；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对于戊戌变法前后文学观念的变化的叙述也很有见地；高崇信、尤炳圻校点的《人境庐诗草》，颇能显示黄诗散文化的特色。但是，总的来说，那时对近代文学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仅从历史的分期来看，就有着很大的随意性，虽然有了一些有关近代文学的研究，但并没有建立起这

门学科。

早在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同志就强调要重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的研究，他说：“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①但是在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只能有少数先行者身体力行。

新中国成立之后，近代文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建国以后，近代文学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立的阶段也开始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开始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近代文学，探求它和近代社会的关系、它和近代其他上层建筑的关系以及它和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关系，考察它的思想和艺术、成败与得失，对一些重要的作家和作品，也进行了比较集中的研究。学术界陆续出现了研究近代文学的论文；高等学校的文学专业，也把近代文学列入了教学计划；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五五级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稿》和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都对近代文学作了专编论述；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九五六级还专门编写了《中国近代文学史稿》；《官场现形记》等几部清末“谴责小说”一再重版；龚自珍、魏源、黄遵宪、谭嗣同、康有为、秋瑾等的全集、文集、诗集笺注或诗文选注陆续出版；北京大学中文系师生选注的《近代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选编的《中国近代文论选》和阿英编的《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晚清文学丛钞》等大型的文学类编也相继问世。据我们粗略统计，建国以来发表的近代文学研究论文、资料共有六百余篇。这些，都表现了三十年来我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实绩。

关于近代文学研究工作的艰辛，一九三六年，郑振铎曾经诉说过其中的甘苦：“我编辑这部《晚清文选》曾用了很大的努力与耐心：一来是因为材料的不易得；二来也因为材料的过多过杂，选择起来觉得非常的困难。如果编一部《古代文选》或唐、宋文选之类，那些材料却还比较容易找得到，且也还比较容易选取其精华。但《晚清文选》的材料却一桩桩都要自己下手去搜罗的，可以说是无所依傍的工作。在各个图书馆里，这一类的材料简直不大有。”^② 这位前辈确实说出了近代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心里话。时间过去四十三年了，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变。建国以来在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成果是近代文学研究者们披荆斩棘，在这片文学史的“处女地”上辛勤拓荒，付出巨大劳动取得的。拓荒者们创业的实绩，自然也格外宝贵。

然而，就目前近代文学研究状况来看，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仍属最薄弱的环节。

以资料工作来说，这本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应该处于先行的地位，但是实际情况却相当可怜。

近代文学的宝库究竟有多大的蕴藏量？迄今为止，还是心中无数。无论是诗、文还是小说、戏剧，都拿不出一个比较完整的书目来。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目》中所录的仅仅是从光绪到辛亥革命三、四十年间（主要是一九〇〇年前后）的作品，远不是全部近代小说、戏曲的书目。

重要作家的作品的搜集、校勘、编辑工作和专题资料的汇编工作，只能说是刚刚开始着手去做。许多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有显赫地位的人物还没有全集或文集。近代距今虽为期不算久远，而资料散失、错讹的情况已相当严重；近代有些诗文的艰涩难懂，并不亚于先秦。在辑佚、辨伪、注释、

作品系年、作家年谱等方面，有着大量的工作要做。而至今，象钱仲联的《人境庐诗草笺注》这样的笺注本，简直是只此一家（虽然它是一种旧式笺注，其中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能令人满意之处，但毕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石达开的伪诗流传多年，解放后的头几年许多人还信以为真；一九六二年，一本辛亥革命烈士诗文选刚刚出版，它的第一篇就被人指出为伪作。这种情况，并不仅仅说明当事者的疏忽，同时也反映了整个近代文学的研究和资料工作还处于落后状态。

三十年来近代文学研究的选题，只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小说方面的研究不算少，但集中在四部“谴责小说”。诗歌和散文，涉及到的作家多些，但以研究政治思想的居多，有关文学方面的微乎其微。比如关于魏源的文章共有二十多篇，其中谈所谓“儒法斗争”的就占十九篇，而研究文学的仅有一篇。关于章太炎的文章也不少，但属于文学方面的只有两篇。关于康有为和严复的研究，则除了各自的诗文选的《前言》和《后记》外，根本没有专题文学论文。对于“曾经主持过南社，集中了当时的时代歌手”^③的柳亚子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缺乏认真的研究。戏剧方面的研究，还只能说是处于准备的阶段。对于反动、落后的作家和文学流派以及近代文学的上下左右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则几乎是一片空白。

这个状况的造成，固然与近代文学研究是个新开辟的学术领域以及研究力量的薄弱有关，但三十年的时间并不算短，八九亿人口的大国也不乏人材，按理应该也完全可以取得比现有的大得多的成绩，之所以不是这样，这里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

我们曾将一九四九年以来发表的有关近代文学的研究论文逐年作了统计，发现它的进退起落的情况，与这个时期在政治、经济战线上出现的正确与错误、繁荣与萧条的马鞍形基本上是一致的^④。这决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它说明了三十年来近代文学研究和整个国家政治形势发展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到了“四人帮”棍棒加镣铐专制的十年，整个研究工作终于完全停顿。至于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年喧嚣了一阵的所谓“评法批儒”，则完全是“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而一手导演的闹剧，根本就不是什么科学研究。

本文不是三十年近代文学研究的全面总结，而是着重于清理多年来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搞乱了的思想，力求找出症结所在，彻底打碎那无形的精神锁链，以求对今后的研究工作能有所裨益。文中涉及到一些观点和问题，决不是针对某个同志来说的，其中，也包括我们自己过去的一些错误认识在内。

二 得失略论

多年来，在研究工作中，似乎有着一条虽不成文但必须遵循的律条：研究工作必须紧密配合当前形势，为中心工作服务，为当前的政治运动服务，为每一项具体的政策、措施服务，并把这种对研究作为政治服务的狭隘理解当作研究工作的根本任务和出发点，当作研究工作的革命性和战斗性的具体表现。这种做法，给研究工作造成了许多危害。

这种倾向的表现之一是：不从研究对象所处的时间、地点、条件出发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而是从当前的政治需要出发，以今天的是非标准去评价历史事件、褒贬历史人物、分析文学作品。

中国的近代社会，是一个资产阶级改良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是考察、研究、分析、评价一切近代历史现象的根本立脚点。中国和欧洲国家的情况不同，它是在被帝国主义的大炮打开了大门之后，艰难地开始自己的近代社会行程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一方面激起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英勇顽强的斗争；另一方面又迫使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向资本主义寻求救国的真理。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从社会思想的来源来说，又成了先生和学生的关系。当时的有识之士，从中外的对比中，逐步认识了资本主义的先进和封建制度的腐朽、落后。他们努力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在内的所谓新学。到十九世纪后期，这种资本主义“新学”的影响，便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中明显地表露出来。集中的表现是维新变法运动，反映在文学上则有“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

鉴于近代中国这样的历史特点，在近代文学的研究中，如何认识外国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和资产阶级文学，就成了一个中心问题。可是，人们由于受到上面所说的那种对研究工作为政治服务的狭隘理解和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却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近代有许多散文，如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和梁启超的许多文章，描绘和歌颂了外国资本主义的事物；诗歌也突破了国界，吟咏资本主义国家的山川风物、英雄豪杰和“声光电化”。这种情况，在黄遵宪和康有为的作品中有着显著的表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对“欧风美雨”更有一种警策之感，他们的诗更为鲜明地歌颂了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这在当时对于向以天朝自居、以犬羊视

外国人的国度来说，无疑是一个时代性的变化。徐世昌曾经用“诗教之盛”、“诗道之尊”、“诗事之详”和“诗境之新”来形容有清一代的诗坛^⑤。其中“诗境之新”指的就是“海通以后”的诗歌描写了外国资本主义的这种新气象。

而解放以来的研究文章，对于上述情况，一般都避而不谈。凡涉及者，几乎都是对于歌颂资本主义的作品一概予以指责，对于暴露资本主义的作品一律予以称赞。如对黄遵宪歌颂日本明治维新的诗篇存而不论，而对于他暴露、讽刺美国总统选举的《纪事》诗则当作稀世之宝同声赞扬。

黄遵宪在出任驻日参赞的时候，目睹日本倒幕尊皇、发展资本主义，十分羡慕，于是乎作《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把日本作为改造中国的榜样；在驻英期间，“乃以为我国政体必当法英”^⑥；而唯独对美国的民主制度表示了惊诧和憎恶：这恰恰表明了他的君主立宪派的立场。美国两党竞选总统，自然有它的龌龊之处，但比封建君主世袭制则是个划时代的进步；比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在国内政治方面）也进了一步。因为它体现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⑦。但在黄遵宪看来，国家的元首是不能选举的；要选，就势必酿成“怒挥同室戈”，甚至闹到兵连祸结、殃及全国的地步。诗中结穴之句“至公反成私，大利亦生弊”，就表示了这个意思。这说明他是从封建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赞美君主立宪的日、英，非难民主制度的美、法，这是当时君主立宪派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政治观点。康有为就认为法国的一切，连巴黎的市政建设和风光都不如伦敦，特别是法国的“官吏之贪横，治化污下，逊于各国”^⑧。梁启超也认为美国的总统制不如英国的首相制，“吾游美国而深叹共和政体，实不如君主立宪者之流弊少而运用灵也。”黄遵宪的《纪

事》诗恰恰反映了他们这些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背后拖的是一条封建主义的尾巴。而我们许多同志所竭诚赞美的，正是他思想中的这个落后面。

在《纪事》诗中，黄遵宪歌颂了华盛顿的开国勋业，幻想没有党争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固然反映出他对资本主义认识的肤浅，犯了他同时代一些人的通病，但在当时来说却是有益无害的。然而，它却遭到了批判。同样，秋瑾的赞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诗，如《我羨欧美人民呵！》，也毫无例外地被指责为“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认识不清”和“赞美资本主义国家”。从资产阶级改良派歌颂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发展到资产阶级革命派歌颂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在当时是一个阶段性的进步，但却被不加分析地统统批判了。

这种情况，同样突出地表现在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的研究中。

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如果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算起，到二十世纪的头几年为止，有四十年之久。它逐渐发展，到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达到高潮。这是一个应世界潮流而起，由中国的社会特点而生，在中国历史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

在那衰败腐朽、一片死寂的黑暗王国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点燃了第一支火把：首先引进了“西学”——翻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著作和文学著作；倡维新，呼变法；提出“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创办报刊，宣传资产阶级的文化科学；形成了相当广泛的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⑩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兴起以

前，改良主义在政治、文化领域中的广泛的启蒙工作，是有它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的。即使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兴起并在政治斗争中起主导作用以后，改良主义在文化、文学方面的积极影响并没有很快消失。资产阶级民主派从兴起到辛亥革命，时间是那么短，他们和改良派的论战也主要在政治方面，他们在文学方面并没有形成如改良派那样的广泛的运动，没有提出比较系统的文学理论，也没有出现影响很大的文学作品。同时，由于这是一个急剧动荡的社会变革时期，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异常激烈而且错综复杂，新旧思潮回环交错，不仅一个派别，即便是在一个人身上，他的政治、哲学、文艺、学术各方面的观点，都可能出现十分复杂、矛盾的情况。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家和理论家的代表人物章太炎，在文体上却是主张复古的保守派。他的诗和文都那么古奥艰深、晦涩难懂。而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的富有感情、活泼动人的新文体，即使当他在政治上堕落成保皇党之后，在青年中仍然受到欢迎。一九〇三年的鲁迅还是梁启超文章的热心读者^⑪。郭沫若回忆他在辛亥革命前几年所受到的文化影响时，把章太炎和梁启超的报刊文字作了比较，认为章太炎的文章实在难以接近，而梁启超的“新兴气锐”的文字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断言，当时的青少年“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⑫。另一位当事者胡适也说，一九二二年以前“二十年来的读书人差不多没有不受他（指梁启超——笔者）的文章的影响的”^⑬。今年，一位散文作家回忆说，在辛亥革命之后，他还为梁启超的解放体文章所大大地吸引^⑭。这一切，都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几部主要的“谴责小说”，大都在本世纪初年问世。那时，清王朝统治集团腐朽到了极点，世界各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清军每战辄败，亡国之祸迫在眉睫，“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掎击之意矣。”^⑮ 这就是说，“谴责小说”是顺应时代社会进步的要求而出现的，它们的作者还不同于一般“暗昧”的“细民”，而是比较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怀着爱国忧民的热忱和愤世嫉俗的激情，全面痛揭了当时社会现实的黑暗，特别是清末专制统治的残酷和官僚机构的腐败；对清廷的卖国丑行和向帝国主义献媚的大小官吏，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猛烈的鞭笞。这些作品虽然也存在着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缺乏认识，看不到人民力量和维护封建制度，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等问题，但前者是历史的局限（即便如当时最先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不能说就已经认识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和人民的力量）；后者固然是应该指出并批判的阶级偏见，但从整个作品来看，毕竟是次要的。他们在作品中虽然没有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正确办法，而是给病入膏肓的封建王朝开了一张可笑的改良主义的药方。但是，它们这种广泛有力的暴露，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于腐朽不堪的封建制度的憎恶，启发人们要求变革现实的觉悟。它们在当时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无疑是起着进步作用的。这些小说的出世年代，正是鲁迅二十岁后的青年时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于它们所作的评价，应该被视为是当时的一种社会观感的如实表露。

由于改良派中的主要成员不能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前进，在一九〇三年以后逐渐成为民主革命的障碍，有些人在政治

上堕落成保皇派，在文化上也成为顽固派；“五四”之后，更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正面论敌，成为批判的对象。因而在当时，没有能对他们作出全面的评价，这是可以理解的。四十年代，郭沫若就曾提出：“前几年我们在战取白话文的地位的时候，林琴南是我们当前的敌人，那时的人对于他的批评或许不免有一概抹煞的倾向，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能够抹煞的。”^⑩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也从政治上对改良派的历史地位作出了科学的评价。但在解放后的近代文学研究中，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研究并没有能给予应有的重视。人们对于肯定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勇气远不如肯定近代史上那些属于旧时代的和带有严重落后成分的农民运动的勇气足。特别在六十年代，大约是为了适应现实斗争中批判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又一次成为学术批判的“靶子”。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到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开展的关于“谴责小说”的批判，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本来，学术界对改良主义“谴责小说”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基本上对它们是肯定的。即使有些争论，也属于学术问题探讨的正常现象。但是六十年代中期开展的这场关于改良主义“谴责小说”的批判，情况则不同了。一篇可以视为对“谴责小说”发难的文章，极力强调讨论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它的结尾说：“近年来的历史证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阴魂不散’，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曾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在今天讨论和研究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为了适应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把历史上的改良主义拉出来当靶子，这个目的说得再清楚也不过了。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不少同志不顾作品的实际内容和产生它的

具体历史背景，抓住小说的作者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政治上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或洋务派和作品中某些主张改良、反对革命的抽象说教，便把“谴责小说”判定为“反对革命、美化帝国主义”的“反动”作品而予以“彻底批判”。

这是一种貌似科学研究的战斗性而其实是对科学研究的践踏。其结果便往往作出了批判先进，颂扬落后的荒唐事情。

这种倾向的表现之二是：不是实事求是地从材料、从作品的客观实际中引出固有的结论，而是根据作家的政治立场、态度和世界观来评判他们的文学事业和学术研究成果；用类似“黄鹂皆好音，乌鸦定恶声”这样简单化的逻辑推理来对待十分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并以此作为研究工作的“革命性”的一种标志。这样就往往肯定了不应该肯定的东西而否定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种情况，在对太平天国文学和某些资产阶级作家、学者的研究中，表现得最为典型。

建国以来对于太平天国文学的研究充分强调了它革命性的一面，这是一大历史进步，但是对于它的明显的缺点和落后面却一概视而不见。

比如，一些论著极力颂扬太平天国提倡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其实，我们在太平天国的文献中根本找不出它提倡这种理论的根据。一些论著往往把《戒浮文巧言谕》作为代表性文献，说它“朴实而有力地陈述了现实主义的基本论点”，“它是彻底打击桐城派古文乃至一切虚伪的封建文学的历史文献”。其实，这种看法并不确切。那篇文告中所说的“文以纪实”、“存真去伪”等并不是指文学和现实社会生活的关系，它所指的是“奏章文谕”、“文移书启”一类的文体。这对当时

的文风虽有一定的影响，但所谓“纪实”、“存真”的要求仅仅是：“首要认识天恩，主恩，东、西王恩。次要实叙其事，从某年、月、日而来，从何地、何人证据，一一叙明，语语确凿，不得一词娇艳，毋庸半字虚浮，但有虔恭之意，不须古典之言。……”^{①⑦}所谓“实”和“真”，只是指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经过。这和文学创作上的现实主义原则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

我们再深入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太平天国的文学理论不仅不是现实主义的，恰恰相反，它正是和现实主义相对立的，其理论基础是唯心主义的神学。它并不主张文学作品要反映社会生活，并不主张作家要深入观察、参与社会生活，而是认为作家只要忠于上帝、忠于天王，就会产生灵感。洪仁玕在《军次实录》中说：“盖读书不在日攀书卷，惟在诚求上帝，默牖予衷，则仰视俯察之间，定有活泼天机来往胸中”^{①⑧}。他现身说法，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说他之所以能够写出好作品，是因为自幼追随天王，效忠天王。由此可见，他是认为文学作品完全来源于思想观念，根本把社会生活排除在外的。而有的文学史在引用上面的话时，单单删去了关键性的“惟在诚求上帝，默牖予衷”两句，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他们的这一主张中，已经注意到了文学创作必须与现实生活相联系，从而更好地反映现实。”这样的研究工作，似乎不能说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在太平天国文学中，洪秀全的诗歌创作具有典型意义。他早期的诗，抒发了他改变社会现状的豪情壮志，起着宣传革命、鼓舞士气的作用；但是后期的诗就不同了，特别是《天父诗》。

《天父诗》收诗五百首，绝大多数是洪秀全为他的后妃们

制定的言行准则、道德规范、纪律，以致于法律。其中有升天堂的诱惑，有五马分尸的威胁。它具体而细微地反映出洪秀全的专制帝王思想、空虚可怜的精神世界和森严恐怖的宫廷生活。在这类诗中，作者是上帝的代表、人间的至尊，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他并不希望以诗的思想和艺术感染读者，而只是以最高权威威胁他的臣民。这类诗是宗教愚昧思想和帝王专制思想相结合的产物。但许多论著却把太平天国的文学一概誉为具有反封建的战斗内容和英雄主义的格调！

关于太平天国的资料，有相当数量保留了下来，上述材料，也均非秘籍，根据这些材料，本来是不难得出比较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结论的，为什么却会出现上述那些不正常的情况呢？究其原因，恐怕是出自这样一种思想——一种公式：对于农民起义，只能肯定、赞扬，不能说它还有什么缺点和局限，否则，就是给农民运动抹黑，就是作者的政治立场有问题。至于后来影射史学的风靡一时，则更给历史科学的研究工作造成了灾难：似乎一谈到历史，就必然影射现实；一谈到历史人物，就是隐喻现实人物，以致把某些问题、某些历史人物的真正的科学研究变成了绝对忌讳的禁区。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工作中出现上述种种不正常的现象，也就毫不足怪了。

对于太平天国文学的研究是这样，对于政治上反动、世界观属于唯心主义的作家和学者的研究，又出现了相反的另一情况。

王国维顽固地维护清王朝，辛亥革命后还以清室遗老自居，哲学上接受康德、叔本华的思想影响，世界观无疑是唯心主义的。但他的许多学术著作，特别是关于戏曲史的研究，却是很有价值的。建国后，曾经有人提出，不能因为王